



三國演義研究集



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《社会科学研究丛刊》之二十一

《三国演义》研究集

《社会科学研究丛刊》编辑部
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所

一九八三·十二·成都

封面设计：张复祥

三 国 演 义 研 究 集

编辑者 《社会科学研究丛刊》编辑部
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出版者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发行者 四川省新华书店
印刷者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印刷厂

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成都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4.25 字数：367千
印数1 ——6500册

书号：10316·2

定价：1.90元

序

今年四月，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《社会科学研究》编辑部 and 文学研究所发起，在成都召开了首届《三国演义》学术讨论会。这是我国《三国演义》研究工作上一次空前的盛会。参加讨论会的有来自全国十七个省、市、自治区的专家、研究工作者、教学工作者和新闻界代表共一百二十多人。讨论会收到论文六十多篇，连同一年多来《社会科学研究》已经发表的论文，共计八十多篇。我们编印的这本《〈三国演义〉研究集》，就是从这八十多篇论文中遴选出来的，大体上反映了这次讨论会的主要成果。

长期以来，我们学术界对于《三国演义》这样一部在中国人民中流传最广、影响最深的优秀古典小说，研究不够，重视不够，这不能不引以为憾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建国以来到一九八一年这三十二年中，国内主要报刊共发表《三国演义》的研究文章计155篇，仅为同期《红楼梦》研究文章总数的十分之一，《水浒》研究文章总数的六分之一。《社会科学研究》编辑部最近做了一件好事，他们看到了这个问题，并且决定以实际行动来吸引学术界同志们的注意。一九八二年，他们在《社会科学研究》上辟出了《三国演义》研究专栏，发表了几组文章，并且加了这样

的编者按：

“《三国演义》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名著之一，问世六百余年以来，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，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。它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，而且是一部通俗的历史和军事的教科书。建国后，在五十年代中、后期，学术界对此书曾经展开过热烈的争论。可是，在这之后的一、二十年间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这种讨论却一直中断下来，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学术界重新广泛开展了对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等我国其他古典长篇小说名著的研究和讨论，而唯独对《三国演义》的研究和讨论迟迟未能充分展开。为此，本刊特将刘知渐等同志的三篇文章，连同本刊整理的《建国以来〈三国演义〉研究情况综述》发表于此，以后还将陆续发表这方面的文章，以期引起学术界重新开展对这部古典长篇小说名著的研究和讨论。”

值得欣慰的是，一年来学术界的同志热烈响应和支持了这一倡议，《三国演义》的研究又开始活跃起来。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三年上半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全国和各省、市的主要报刊，就发表了研究《三国演义》的论文三十多篇，还出了一些专著。加上本集第一次发表的论文，当在五十篇以上。大约相当于三十二年成果的三分之一。

研究工作的进展，不仅表现在论文数量的增加，而且表现在论文质量的提高和一些研究领域的开拓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，古典文学研究中“左”的思想影响得到了逐步的清除，“百家争鸣”、“古为今用”的方针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，我们就有可能对这部作品，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作出科学的、实事求是的评价，真正做到各抒己见、畅所欲言，使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在竞争中得到发展。在这次讨论会和本文集中，无论在作品的主题思想、艺术特色的分析上，

在作者和版本的考订上，在作品人物的评价上，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，而且对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以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，对作品与其他文艺形式的继承借鉴关系上，还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，这就为今后全面地、系统地开展《三国演义》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当然，我们现在的工作还仅仅是初步的，很多问题尚待进一步深化，不少方面还需要去进一步开拓研究领域。例如，对于作品主题思想的研究，就要求我们解答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文艺现象：为什么《三国演义》从它出世以来，一直能得到各个阶层人民的共同喜爱，不同的人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自己的精神力量。这就得对作品反映的时代、写作的时代、流传的时代进行阶级的、历史的具体分析，对正统思想、“忠”“义”道德以及“智慧”、“谋略”等传统观念作出科学的解释。又如，对民族化和民族形式的探讨方面，在我国古典小说中，在创造人民大众“喜闻乐见”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上，《三国演义》可以说是一个范本，在此以后，也有人写了多种多样的历史演义，都没能达到《三国演义》的高度，那么，《三国演义》的创作经验在哪里？再如，对作者的情况，目前我们还知道得太少。但是，我们可以肯定，如果作者没有对社会历史的深刻了解，没有丰富广泛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历，没有高超的文学艺术天才，是绝对写不出那样恣肆汪洋、景象万千、宏伟壮阔、龙腾虎跃的“百科全书”来的。建国初期，开展《红楼梦》研究时，对作者曹雪芹的情况同样知道得不多，现在不是也搜集到大批资料了吗？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刻意发掘，悉心收寻，有锲而不舍、沙里淘金的精神，总可以使作者的面貌在我们眼前逐渐清晰起来。

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、河南省文学学会根据首届《三国演义》学术讨论会的建议，决定于明年四月在洛阳召开第二届《三国演义》学术讨论会，主要探讨：（一）《三国演义》

的主题及思想倾向；（二）《三国演义》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；（三）《三国演义》在中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。这次会必将把《三国演义》的研究工作大大推进一步。

我们希望，对于《三国演义》的研究，每年能开这样一次有准备有内容的学术讨论会（包括小型的、专题性的讨论），每年能出一本反映主要研究成果的论文集，坚持下去，年复一年，每年有所进展。那么，十年、二十年、几十年之后，必将出现丰硕的成果，对继承和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，对通过形象化的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。

谭洛非

1983年7月24日

目 录

序	谭洛非
重新评价《三国演义》	刘知渐(1)
《三国演义》构思基础质疑	李厚基(19)
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	
——从魏、蜀矛盾看《三国演义》	
的思想内容	黄 钧(30)
试论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	曹学伟(47)
从“合久必分”到“分久必合”	
——《三国演义》主题辨	胡邦炜(60)
论“全景军事文学”《三国演义》	陈 辽(76)
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应从军事角度认识	任昭坤(90)
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范本	
——论《三国演义》的人物描写	傅继馥(101)
试谈《三国演义》的对比手法	王晓家(119)
浅谈元杂剧三国戏的艺术特征	郭英德(129)
《三国演义》的战争描写	赵清永(140)
重提旧案说曹操	程一中(153)
也谈嘉靖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中的曹操形象	
——兼与刘敬圻同志商榷	胡振务(175)
试论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刘备	蒋维明(187)

谈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中诸葛亮形象的形成和塑造	刘益国(197)
从用人得失论孙吴集团	
——《三国演义》人物管窥之一	詹 寰(211)
魏延反乎?	梅水溪(228)
巾帼不让须眉	
——论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妇女的艺术形象	剑 锋(234)
罗贯中与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	王利器(240)
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成书于明中叶辨	
——与王利器、周村、章培恒等同志商榷，兼论此书小字注的问题	张国光(266)
试论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的成书年代	欧阳健(280)
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是元代作品	刘友竹(296)
《三国演义》形成过程论略	陈周昌(306)
有关毛本《三国演义》的若干问题	黄 霖(326)
元代的三国戏及其对《三国演义》的影响	李春祥(344)
古典文学形象的艺术稳定性和变异性	吴 红(361)
试论《三国演义》的白璧微瑕	刘明浩(376)
《花关索传》对《三国演义》研究的启示	谭良啸(388)
建国以来《三国演义》研究论著索引(一)	
(1950.1——1982.12)	沈伯俊 整理(398)
国外《三国演义》研究部分论著目录	王丽娜 编译(414)
首届《三国演义》学术讨论会综述	胡邦炜 沈伯俊(419)
建国以来《三国演义》研究情况综述	沈伯俊(432)
跋	李希凡(443)

重新评价《三国演义》

刘 知 渐

《三国演义》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。在五十年代末期，由于郭沫若同志对它作了一句轻率的否定，曾经引起过学术界的热烈的争论。后来，极左思潮愈益猖獗，《三国演义》竟被全盘否定，到今天也还没有做出比较可信的评价。为了进一步研究这部小说，我写出一点个人的浅见。

罗贯中和《三国演义》的成书时代

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为罗贯中，这是没有多大争论的。由于封建社会轻视小说、戏曲作家，因而关于罗贯中的历史记载较少，这也是不足为怪的。个别研究工作者因此而怀疑罗贯中这个人物的真实性，说他是“乌有、子虚”式的人物，就未免太武断了。

根据元末明初人贾仲明所著的《录鬼簿续编》记载：

罗贯中，太原人，号湖海散人。与人寡合。乐府、隐语，极为清新。与余为忘年交，遭时多故，

天各一方，至正甲辰复会。别来又六十余年，竟不知其所终。

这段文字后面，接着记载了罗贯中所写三个杂剧的剧名：一为《赵太祖龙虎风云会》，二为《忠正孝子连环谏》，三为《三平章死哭蜚虎子》。

迄今为止，只有这点史料记载了罗贯中的简历。其中也还小有疑问，需要考证一下。

第一，史料说罗贯中是太原人，而嘉靖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卷首，有一篇“庸愚子”（蒋大器）在弘治甲寅（1494）年所作的序文中称罗贯中为东原人。这个刻本很早，刻工又很精整，致误的可能性较小。贾仲明是淄川人，自称与罗贯中“为忘年交”，那么，罗是东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。《录鬼簿续编》出于俗手所抄，“太”字有可能是“东”字草书之误。因之，我们赞成罗贯中为东原人的说法。

第二，罗贯中的年代，从《录鬼簿续编》的“至正甲辰复会”六字，可以作个大致的推算。因为贾仲明在《录鬼簿续编》书后，自称为八十云水翁，其时间为“永乐壬寅”，亦即明成祖的永乐二十年（1422）。由此上推到“至正甲辰”年与罗贯中“复会”的时候，他已经二十二岁了。他自己说曾与罗贯中“为忘年交”，后来又“不知其所终”，可见罗贯中比他要大二十岁以上，才合情理。那么，罗贯中在“至正甲辰”这年，也该是四十二岁以上的人了。贾仲明和他最后见面时，他已写了三本杂剧，被贾仲明记入了《录鬼簿续编》。可见这时的罗贯中，已经是一个知名的戏剧作家了。贾仲明虽然没有提到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可能是尚未完成，不为贾仲明所知。但一个作家的创作活动，一般总是四十岁前后为最旺盛时期，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，有可能是这段时期开始酝酿或已从事写作，而完成于元明之际的。有人怀疑《三国演义》如为罗贯中所作，何以不在明初出版，而到

一百多年以后的嘉靖初年才出版呢？其实这也不难解释。第一，民间文学刚刚出世，不易得到承认，必须要经过一段时期的传抄，然后才有刻本。第二，嘉靖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（涵芬楼改题为明弘治本，实误）是现今看到的第一个《三国演义》的版本，刻工异常精美，不亚于当时所刻经史书籍，显然已不是第一个刻本了。第三，宋元之际已经出现过不少长篇历史评话，给长篇小说提供了创作经验，到元明之际才出现长篇小说，也是十分自然的，这有什么可怀疑呢？

明人王圻的《稗史汇编》有一条记载说：

宗秀、罗贯中、国初葛可久，皆有志图王者，
乃遇真主，而葛寄神医工，罗传神稗史……。

不管这一记载是否属实，但罗贯中既然生活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漩涡中，不能不受点影响，而而志于反元起义的活动。他的中壮年时代，正是韩山童、刘福通在中原地区高举恢复宋朝汉族政权的大旗来发号施令，并于元至正十五年乙未，改元为龙凤元年，正式立韩林儿为大宋皇帝，杀向北宋王朝的故都——汴京，于至正十八年戊戌五月把汴京光复了。从宋高宗南渡以来，汉族人民经过二百四十多年的斗争，终于第一次光复汴京，这该多么令人兴奋啊！

龙凤政权发出过“慨念生民，久陷于胡，倡议举兵，恢复中原”的檄文（郑麟趾《高丽史》卷三九）。同时又在军旗上大书“虎贲三千，直扫幽燕之地；龙飞九五，重开大宋之天”（《辍耕录》）。当罗贯中看到这个现实的时候，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振奋。他的《赵太祖龙虎风云会》这本杂剧，写宋太祖赵匡胤做了皇帝之后，在一个风雪满天的夜晚，亲访丞相赵普，商讨统一中国的大计。他在赵普家中，称赵普为“老兄”，称赵妻为“嫂嫂”，表现了礼贤下士，以平等态度待人的风度。在谈话之间，他对士、农、工、商、兵的辛苦生活，十分关怀。这不是历史上

的宋太祖，而是罗贯中对龙凤皇帝的希望，希望他也像戏中人宋太祖那样礼贤下士，关心人民，才能取得恢复民族政权、重新统一祖国的胜利。

因之，我们不妨认为《三国演义》把全部热情倾注在蜀汉政权上面，写刘备礼贤下士，信任诸葛亮，以平等态度对待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……等等；和诸葛亮的为“汉家天下”而“鞠躬尽瘁”，也是把广大人民反元复宋，重新统一祖国的无限热情倾注到作品里面去了。

由于《三国演义》的版本多，插手的出版家及其雇佣的编辑人员，对原本多所“润色”，明代末期就有人把原来的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，由二十四卷二百四十段，加以合并，每两段合成一回，把全书合成一百二十回，成为“章回小说”。清初毛宗岗评点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假托金人瑞（圣叹）作序，称为“第一才子书”，批语的八股腔，适合当时的群众口味，销路很广，明代早期的其它版本反而销路不好，流传渐渐稀少了。但总的说来，从较早刻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到毛宗岗评本《三国演义》，个别字句虽然小有增删，但其热爱蜀汉政权，希望由它恢复汉家天下，重新统一祖国的基本倾向，以及尊敬刘备、关羽、张飞、诸葛亮等人物的基本态度，是没有什么改变的。

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一部《新刻全像通俗三国志传》，据说是明代后期刻本，它也和嘉靖刻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一样，不分章回而分卷分段，但文字不及嘉靖刻本简洁，很有可能是根据一个较早刻本翻刻的，在某些方面也有可能更接近罗贯中的原著。但周村同志的《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》一文（一九八〇年《群众论丛》第三期），根据这个刻本中“玉泉山关公显圣”一段里面，有“迨至圣朝，赠号义勇武安王”字样，断定《三国演义》为宋人作品，我认为值得慎重考虑。尽管《三国演义》成书于元明之际，不能像某些文学史那样，把它称做“明清小说”，但也不能

说它成书于宋代。版本考据上常常根据书中的语气、地名、抬头、避讳等等来判断成书或刻书的年代，这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信的，但也不可一概而论。元朝历史短，个别汉族知识分子不承认元朝而奉宋朝正朔。罗贯中又生活于刘福通、韩山童力图恢复赵宋政权而改元龙凤的时期，在作品中使用“圣朝”字样来称呼北宋政权，仍然是可能的。即使不这样理解，而把它理解为罗贯中采取宋代留传下来的评语为素材时，保留了宋人“说三分”的口吻，仍然是合情合理的。这个本子中的关索故事，是评话艺人创造的，它不见于嘉靖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，说明这个刻本有可能是早期刻本的翻刻，比嘉靖本保留了更多的评话痕迹。也有可能是“新刻”者从民间另一评话里把这个故事新加进去了。明代后期的长篇小说中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（如《水浒传》），不能据此以判断《三国演义》成书于宋代。

虽然《新刻全像通俗三国志传》不会成书于宋代，但这个本子和嘉靖刻本大体相近，分卷而不分回，内容又较嘉靖刻本丰富，至少是不同于嘉靖刻本的一个别本，很值得注意。我们希望出版部门，尽快把这个本子影印出来。这对于深入研究《三国演义》是大有益处的。

《三国演义》素材的主要来源

《三国演义》的素材，有两个主要来源：一是来源于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及朱熹《通鉴纲目》；二是来源于民间评话艺人的话本，而后者是更为主要的。在嘉靖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的卷首，“庸愚子”（蒋大器）所作序文中有这样几句：

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，令瞽者演说，其间言词鄙谬，又失之于野，士君子多厌之。

若东原罗贯中，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，自汉灵帝

中平元年，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，留心损益，目之曰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。

在这个本子的首卷，还刻有两行文字，一行是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”，一行是“后学罗本贯中编次”（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把这两行删去了）。它的作用也和“庸愚子”（蒋大器）所有序文一样，是为了标榜《三国演义》源于正史，有根有据。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：第一，罗贯中不仅采用了《三国志》及裴松之注；而且还采用了其它史书，如朱熹的《通鉴纲目》即其一例。因为《三国志》是按魏、蜀、吴三国各自的历史，分写成《魏志》、《蜀志》、《吴志》而合称《三国志》的。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却并未把魏、蜀、吴三国各自独立起来分别叙述，而是以蜀汉为中心，按编年史顺序来叙述故事发展的。“庸愚子”（蒋大器）序文中，不是也说《三国演义》所叙故事，始于汉灵帝中平元年，终于晋太康元年吗？罗贯中的时代，恰是朱熹《通鉴纲目》流行的时代，又恰是以蜀汉为中心来叙述三国历史的。所以，我们认为罗贯中所依据的历史书，不仅仅是《三国志》及裴松之注，同时还依据了《通鉴纲目》。

第二，“庸愚子”（蒋大器）的序文，批评了民间艺人“演说”的“评话”，说他“言词鄙谬”，以便抬高《三国演义》作为历史书的价值。其实，《三国演义》的艺术价值，正是由于罗贯中继承和发展民间艺人所“演说”的“评话”，如《三国志平话》之类，才创造了这部优秀的历史小说。如果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仅仅是一部通俗的历史书，而没有文艺性，它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魅力了。现今流传的各史通俗演义也有好多种，为何读者只喜欢《三国演义》呢？原因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价值，不在于仅仅叙述了三国历史，而在于创造了艺术性较强的历史故事。而这些艺术性较强的部分，往往是胚胎于宋元人“说三分”的评话。所以，我们认为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虽然取材于《三国志》及

裴松之注文，还采用了《通鉴纲目》，而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宋元人“说三分”的评话。在南宋时期，“说三分”已成为一种专业性的“评话”艺术，内容必然精采而丰富，到了元代，仍然没有衰落，《三国志平话》的出版，就是一个证明。

现今保存下来的《三国志平话》，为元英宗至治年间所刻“评话”丛书中的一种，时间为公元一三二一年至一三二三年之间，出版者为“新安虞氏”，总标题为《至治新刊全相平话》，样式为蝴蝶装，书头有连环画，是我国较早的“评话”丛书。由于封建时代不重视民间文艺，国内久无传本。只有残本五种，在日本内阁文库里幸存下来。其中有《武王伐纣平话》一种，是最早的一本历史“评话”，有可能是《封神演义》的来源。最晚的一种就是《三国志平话》了。它应该是宋元人“说三分”的话本之一，既然标明“新刊”，就可能还有“旧刊”，可惜现在看不到了。

单就这个幸存的《三国志平话》来看，它的情节基本上出于虚构，把它和《三国演义》一对照，就可看出罗贯中吸取了这些虚构的情节，再加以丰富和渲染，才构成了《三国演义》中的精采部分，从而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。例如《三国志平话》中的“桃园结义”这个“段子”（评话术语），就是《三国演义》中“祭天地桃园结义”（据嘉靖本，下同）的雏型。《三国志平话》中的“曹公赠云长袍”及“云长千里独行”和“关公斩蔡阳”等段子，就是《三国演义》里“关云长封金挂印”、“关云长千里独行”、“云长擂鼓斩蔡阳”等情节的雏型。《三国志平话》中的“张飞拒水断桥”、“鲁肃引孔明说周瑜”、“黄盖诈降蒋干”、“赤壁鏖兵”等段子就是《三国演义》里“张翼德据水断桥”、“诸葛亮智说周瑜”、“黄盖献计破曹操”、“周公瑾赤壁鏖兵”等精采情节的雏型。

上述《三国演义》的这些情节，在史书上往往毫无根据，或

者仅有极微小的“一点因由”，经过评话艺人的想象、虚构和夸大，构成了艺术细胞，才给罗贯中提供了构思的基础，不难想见，如果没有民间评话艺人的艺术创作，给罗贯中提供了丰富的养料，罗贯中就只能写出一本通俗的三国历史教科书，而不可能写出具有惊人魅力的《三国演义》了。清代史学家批评《三国演义》“七实三虚”，是就历史角度来说的。如就历史小说的角度看，《三国演义》的价值就在于这些“虚”的部分；而这些“虚”的部分，又是以《三国志平话》为基础的。“庸愚子”（蒋大器）为嘉靖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所作序文中贬低评话艺术的观点，显然是不正确的。

当然，优秀的文艺家从来不是懒汉，他们不停滞于模仿民间文艺，而是在民间文艺的基础上，进行更高级的艺术创造，给人民大众以更美好的艺术享受，使之成为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。这就叫做“植根于人民而又千百倍地还给人民”，那些单纯地模仿民间文艺的懒汉，是没有什么出息的，而罗贯中并非如此。试以下列故事为例，略略加以说明。

在《三国志平话》的“鲁肃引孔明说周瑜”这个段子里，描写周瑜这位少年将军贪恋妻子小乔的美色，不愿离开家庭到前线去抵抗曹兵。诸葛亮就劝周瑜说：

曹操动军远收江吴，非为皇叔之过也。尔须知曹操长安建铜雀宫，拘刷天下美色妇女。今曹相取江吴，肤乔公二女，岂不辱元帅清名？（原文如此，有误字，未予改动。）

周瑜果然被诸葛亮激怒了，下决心和刘备一起联合抗曹。这个情节没有历史根据，可能是从“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”两句唐诗想象出来的。因为曹操也是一个酒色之徒，铜雀台上养有不少官伎，如果赤壁之战获得胜利，把“乔公二女”俘到铜雀台上作官伎，完全是可能的。评话艺人受到诗人杜牧的启